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及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6-47

2006年8月2日

歷史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

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 易富賢

一、前言

《光明日報》1979年8月5日有一文章標題是〈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意思是毛澤東1959年“錯批”馬寅初，從而“誤增三億”人口。並於1980年開始獨生子女政策。從此之後，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因到人口過多。

在一般人眼裡，中國一切問題都是因為人口過多：近年電力短缺、糧食短缺，人們將之歸罪於人口過多，但其實真正原因是1998年以來幾年減少電力投資和糧食政策失誤。¹

現在就業壓力大，人們將之歸罪於人口過多，其實很大程度

¹ 易富賢：〈從現在電力短缺看將來老年化〉，參見：<http://guanacha.gmw.cn/show.aspx?id=943>。

是因為 1979 年以來的教育失誤，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見，全世界 190 多個國家中有 170 多個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但我國卻沒有，而有限的經費又主要投入到高等教育，導致大學生和低素質人找不到工作，技術工人卻奇缺，結構性民工荒已經開始。

春運期間火車擁擠，人們將之歸因於人口過多，其實真實原因是因為中國人均擁有鐵路才 5.5 釐米，不及一支過濾嘴香煙長，在世界上排在一百位之後，並且世界上有幾個國家像中國這樣人員流動集中在春節這樣短的期間？

中國近年城市環境污染嚴重，人們也將之歸罪於人口過多，但其實中國環境污染是中國粗放式的發展模式，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意味著中國現在環境污染部分是發達國家轉嫁過來的）。即便如此，中國森林面積在持續增長，沙化土地在開始減少。

有人認為是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人口過剩，1980 年才不得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這是對毛澤東錯誤人口政策的補救，要是沒有毛澤東的鼓勵生育也就沒有後面的計劃生育了。

總之，人們認為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因為毛澤東沒有採納馬寅初的人口論，反而鼓勵生育造成的，要是當年採納馬寅初人口論的話，中國生活水平早就趕上美國了，也沒有就業壓力，也沒有環境污染了。

本文從多個方面探討中國人口問題的由來，看看中國人口問題真是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的嗎，看看要是當年採納馬寅初人口論控制人口會怎麼樣。

二、調控人口的兩隻手決定了人口增長呈 S 形變化

《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任何事物都有內在的調

控規律，人口也一樣。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調控著人口的數量，在古代通過戰爭、饑荒、自然災害、疾病和瘟疫等激烈手段（我們姑且稱之為“左手”）；現在通過不明原因的降低生育能力（我國不孕不育人群比例 20 年增十倍，已從 20 世紀 70 年代的 1~2% 上昇至現在的 12.5%，接近發達國家 15~20% 的比率）、晚婚、離婚、避孕、養老社會化、養育成本增高、減少性生活（電視、電腦等娛樂活動）、降低生育願望等溫柔手段（姑且稱之為“右手”）。人類文明的進步導致調控人口的手段由“左手”換成“右手”。

在過去“左手”引起的高死亡率的時期，人類繁衍非常緩慢，在這個過程中無數民族相繼滅絕，整個人類也曾幾度到了滅絕的邊緣，為了維持民族的生存，就必須有高生育率；而近代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掌握了對付傳染病和自然災害的能力，大大削弱了“左手”的力量，死亡率下降，壽命在延長，這個時期仍然維持高生育率的話，就會出現人口過度膨脹，這個時候“右手”的作用就開始顯現。這種“左手”、“右手”交替調控的方式，決定了人口呈長 S 形變化：數千年的低水平平穩期，兩百多年的急劇上昇期，然後是人口高水準平穩期。

這種“左右手”交替過程中存在一個“視窗期”，這個時期生育率仍然高，但死亡率已經開始降低，壽命開始延長，這就是人口 S 曲線的上昇期，這個“視窗時期”越長，人口增加越快，一個民族佔全球份額越大。任何國家在這個“視窗時期”都會有人口壓力，英國在 18 世紀處於這個“視窗期”時馬爾薩斯寫下人口論就是明證。但也正是這個“視窗時期”充滿生機、活力，是一個國家國力上昇最快的時期，大量年輕有活力的人口本身就意味著巨大的創造力，在人口壓力面前人類的創新精

神是無止境的，18、19 世紀歐洲處於這個“視窗期”的時候完成了產業革命，奠定現代文明的根基。現在中國和印度的高速發展也得益於這個“視窗期”，這個時期會湧現出大量的科技和思想的創新，對此要加以鼓勵而不是打擊。這個“視窗期”也是一個混亂的時期，一個容易出錯誤的時期，一旦失誤將導致國家和民族從此走向衰敗，因此為政者需要有清醒的頭腦，樹立起可持續的發展觀。

要是所有國家都是同樣長度的“視窗期”的話，等於各國人口增長 S 形曲線是平行的，等人口平穩下來後各民族份額基本不變。1800~1949 年中國人口波動在 4~5 億，屬於 S 形曲線的下端；而發達國家卻處於“視窗期”，人口快速上昇，這段時間中國人口佔全球比例是不斷下降的。在 1949 年後發達國家已經到了 S 形曲線的上端，人口在低慣性增長；而中國卻進入“視窗期”，人口快速增長，中國人口佔全球比例恢復性增長，會有人口“膨脹”壓力，但熬一熬也就過去了。要是不人為干預的話，中國人口在 2040 年左右達到 S 曲線的頂峰，中國人口佔全球份額將會部分恢復。換句話說，西方國家人口增加早，平穩的也早，中國人口增加晚，平穩的也晚，最後人口平穩下來後中國佔全球比例將得以部分恢復。中國的計劃生育等於是人為主動縮短這個“視窗期”，減少“以人為本”的“本”。

三、1800 年以來中國、法國、英國

對付人口壓力的三種方式

在 17 世紀之前，世界人口波動在低水平，中國人口一直波動在數千萬，18 世紀（康熙、乾隆時期）由於美洲高產作物（如土

豆、紅薯、玉米等)在中國得以普遍種植，使得糧食數倍增加，土地對人口的承載能力大為增加，而政局穩定，“攤丁入畝”的稅收政策解除了政府對人口的限制，等於減弱了“左手”作用，其時“右手”卻沒有出手，在這個“視窗期”中國人口快速增長（同期歐洲、亞洲等適合種植這些作物的國家的人口也增加迅速），1792年乾隆皇帝說：“朕查上年各省奏報民數，較之康熙年間，計增十餘倍”。到1800年左右中國人口增加到四億，接近全球人口40%。

但自從19世紀初開始，糧食增產再次達到極限，中國的洪亮吉在1893年寫了《治平篇》、英國馬爾薩斯於1898年出版《人口原理》，揭示了人口繁衍速度同經濟發展速度之間的矛盾。面對人口膨脹壓力，中國、法國和英國採取了三種不同的對策。

中國由於地大物博，政府沒有感到迫切的壓力，採取不作為的方式（當時還是乾隆盛世，完全有潛力找出對策），聽任人口重新由“左手”調控，在其後的一百多年由於戰亂、疾病、瘟疫等，中國人口停止增加，到民國初期仍然祇有四億（佔全球25%），到1949年增加到5.5億，現在為13億（佔全球20%）。

法國採取被動措施，通過加強“右手”力度，減少人口出生。按照孫中山的說法：“法國人因為講究快樂，便極歡迎馬氏（馬爾薩斯）的學說，主張男子不負家纍，女子不要生育。他們所用減少人口的方法，不但是用這種自然方法，並且用許多人為的方法。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薩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薩斯學說的毒。”

而人口密度最高、資源最缺乏的英國面臨的壓力最為急迫，採取主動措施減弱“左手”力度，完成產業革命，建立殖民地，

一方面從殖民地獲取糧食，另一方面通過移民緩解本國人口壓力。

換句話說，法國是自動縮短“視窗期”，而英國是儘量延長“窗口期”。英法兩國對付人口壓力的兩種方式產生的後果截然不同。1800年法國人口2744萬，英國人口1500萬左右（其中本土人口一千萬左右，移民美洲、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區的五百萬左右）。現在英法兩國本土人口均為六千萬，就是說這兩百年，法國本土人口增加2.2倍，英國本土人口卻增加六倍。而法國移民遠遠比英國移民少，比較集中的是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現在美國人口2.957億，加拿大3280萬，澳大利亞兩千萬，新西蘭四百萬，美國、加拿大人口中英國移民後裔佔40%以上，澳大利亞、新西蘭人口中英國移民後裔佔70%以上。那麼最為保守估計，1800年的時候1500萬英國人現在的後裔有2.1億，增加14倍（同期中國人口祇增加3.2倍）。而法國加上移民後裔也祇增加2.5倍左右，就算現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人口中10%是法國移民，最樂觀估計也絕不會超過3.5倍。法國是有名的人口停滯之邦，也是世界上人口結構最早從成年型進入老年型的國家。原本是歐洲一支方言的英語已經成為世界語言，而原本輝煌的法語卻面臨被淘汰的危險（而西班牙語卻因為拉美等地西班牙語人口的快速增長變得越來越重要）。

英國移民固然佔有世界的主要資源，但對全人類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近代科技、制度的進步主要都是英國和美國這兩個英語國家所引發的，全人類受益。還是我那句話：人口爆炸導致科技爆炸。

還有一個類似的例子：明朝政府空有全世界最強大的海軍，但不主動出擊，反而因為懼怕倭寇的侵擾而被動閉海，明朝中期

延續到晚清的閉海政策使得中國失去制海權，屢受列強欺辱。

從英法兩國的人口政策和中國在制海權上的失誤看，“主動”與“被動”確實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科技不斷進步，單位土地對人口的承載能力不斷增加，中國現在對人口的相對壓力遠比當年英國要小，在資源、市場已經全球化的今天，難道我們還要被動單獨減少我們民族的人口？

縱觀中國人口史，中國人口是數千年的低水平平穩期，一百年左右的快速增長期（1700~1800年），一百多年的中水平平穩期（1800~1930年），十幾年的低速增長期（1930~1949年），30年的快速增長期（1950~1980年），然後是低慣性增長期（1980~2020年），最後是：

- A、高水準穩定期（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的話）
- B、緩慢減少期（停止計劃生育但不鼓勵生育的話）
- C、快速減少期（繼續現行計劃生育政策）。

四、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解放初中國的高生育率

中國人口在停滯了一百多年後，於1949年後再次快速增長，由1949年的5.5億增加到1959年的6.6億，1970年的8.5億，1976年的9.5億，再到1980年的十億。一些人產生了恐慌心理。驚呼中國已人滿為患了，並不假思索將人口問題歸到毛澤東身上，“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廣為流傳，意思是毛澤東1959年“錯批”馬寅初，從而“誤增三億”人口。中國人口由1950年的5.63億增加到1980年的10.01億，增加1.78倍；與此同時中國臺灣地區人口798萬增加到1785萬，增加2.24倍，大陸怪毛澤東，那麼臺灣怪誰？

我們看看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人口快速增加的。社會越不發達，生產力水平低下，生活水平低，死亡率高，就必須有高的生育率才能維持社會可持續發展，養育孩子相對成本低，生育意願也高；社會越發達，生產力水平高，死亡率低，社保制度健全，養育孩子相對成本高，生育意願低，生育率也就低。這在人類歷史上是普遍現象，這種現象是由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也就是民間所說的“越窮越生”（但越生並不越窮），中國古代風水學就有“財丁不可兩旺”的說法。

國際上一般採用人類發展指數（HDI）來衡量人民生活質量。筆者根據聯合國計劃開發署的資料，比較了世界各國的HDI和總和生育率，發現HDI越高，生育率越低，二者直線負相關。² 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生育率都非常高。比如歐洲國家的HDI在 0.9 以上，但平均總和生育率祇在 1.5 左右；布隆迪、尼日爾、塞拉里昂等非洲國家的HDI在 0.3 左右（中國 1960 年代水平），平均總和生育率在 7.0 左右。

縱向來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隨著 HDI 的提高，進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 0.51~0.8）行列後，都經歷過從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轉化（從“視窗期”進入 S 形頂端）。HDI 0.5 是個分水嶺，低於 0.5 的國家，生育率都在 6.0 左右，而 HDI 超過 0.5 之後，生育率都將快速下降。

中國的 HDI 在 1950 年才 0.159（印度 0.16），經過 25 年的努力，在 1975 年 HDI 達到 0.525（相當於美國 1880 年左右的水平、印度 1992 年的水平）。就是說中國在 1970 年之前屬於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在這個發展層次的國家都是 6.0 以上的高生育率的。

² 易富賢：〈從人類發展指數看停止計劃生育的急迫性〉，參見：<http://guanchar.gmw.cn/show.aspx?id=6466>。

而 1970 年之後，中國已經步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即使不實行計劃生育，生育率也會急劇下降的。

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是憑減少人口提高 HDI 的。美國 HDI 從 1870 年的 0.467（中國 1960 年代水平）增加到 1913 年的 0.733（中國 2001 年的水平），花了 43 年；日本 HDI 從 1870 年的 0.160（相當於中國 1950 年水平）昇高到 1950 年的 0.607（中國 1987 年水平），花了 80 年。

正如胡鞍鋼所指出：“在構成人類發展指數的三項指標（人均 GDP，平均預期壽命，教育發展水平）當中，教育是一項最為關鍵的指標。教育本身就是人類發展水平高低的一項衡量指標，同時教育對於提高人民的收入和預期壽命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因而教育既是人類發展的目標，也是人類發展的手段，是人類發展的目標與手段的統一，在人類發展中居於核心的地位。”鄧小平也說過：“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勞動者的素質，取決於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巨大優勢是任何國家比不了的。”素質低，人口就是沉重的負擔；素質高，人口就是巨大的人力資源和人才優勢。怎樣才能變人口負擔為巨大的人力資源優勢？矛盾轉化的條件就是教育。毛澤東注重人口素質的提高，把對教育的投入看成了一種國家長期性的戰略投資。相對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來說，1979 年之前中國的基礎教育做得令人刮目（基本上是免費義務教育），每個公社（現在的鄉）都有高中（而現在每個縣才有幾所高中）。³ 然而中國在 1980 年實行嚴厲計劃生育後卻同時降低了對教育的投入，農村初中畢業生上

³ 參看：〈農村離免費義務教育有多遠？〉，人民日報《中國經濟週刊》（<http://www.zgjzk.cn/document/2004/200445/fm wz.htm>）。

高中的比例一下子降低了很多，國家對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見，祇佔國民生產總值的 2~3%，比非洲窮國都少，低於世界平均 5% 的水平，低於聯合國要求的 6%；在全世界 191 個國家中，有 170 多個國家都做到了免費義務教育（我國HDI排名 85 位），而偏偏我們沒有做到，一些農村的基礎教育還得靠“希望工程”。教育成了家庭的主要負擔，導致現在還得靠出賣廉價勞動力。而有限的經費又主要投入到高等教育，導致大學生和低素質人找不到工作，技術工人卻奇缺，結構性民工荒已經開始。科技投入比例也是罕見的少。自主創新能力與國際的差距日益拉大。

要是將 1980 年開始的計劃生育和教育失誤在一起看的話，等於中國白白減少 1.3 億人口，既減少今後勞動力的數量，又降低勞動力的素質，白白犧牲可持續發展能力。

五、中國人口“過剩”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嗎？

新中國成立之際，美國艾奇遜暗示，中國政府解決不了自己的糧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祇有靠美國的麵粉才有出路。艾奇遜這些言論在當時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中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毛澤東針對艾奇遜的觀點，針鋒相對的指出：“革命的發生是由於人口太多的緣故麼？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於人口太多麼？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麼？美國 174 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於人口太多麼？”、“中國人口衆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產”、“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的

領導下，祇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衆多、物產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⁴

1980 年代，毛澤東的上述觀點引起了很大的爭論，被一些人認為是毛澤東主張人口越多越好、鼓勵生育的主要根據。

其實毛澤東的這些講話祇是為了消除艾奇遜言論的負面影響，並不表示真的鼓勵生育。同樣，針對核威脅，毛澤東也說過“不怕死人”的話。說什麼並不表示做什麼，要看當時說的目的。

並且毛澤東否定中國人口過剩的觀點本身並沒有錯。三聯書店在 2000 年出版《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作者為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之子李中清。在這本書中，作者用非常詳盡的資料和嚴謹的分析，證明了中國在過去的三百年間，即使在清朝後期，也根本沒有過“人口過剩”。馬爾薩斯的中國人口觀是完全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極度無知的基礎上。

18 世紀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時候，中國婦女平均祇生育六個孩子，說明中國婦女現實極限生育率祇能在 6.0 左右。有人將中國人口問題歸因於毛澤東時期鼓勵生育政策。其實中國祇在 1953 年之前鼓勵過生育（戰後大多數國家都這樣）。但 1950~1953 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仍然祇有 6.0 左右（這幾年分別為 5.81，5.7，6.47，6.05），與 1949 年之前沒有差別，也與當時的韓國、越南、泰國、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國臺灣沒有差別（這些國家和地

⁴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區當時生育率都在 6.0 左右)。難道這些國家和地區也鼓勵生育了？可見中國當時鼓勵生育起效不大(因為當時本身就接近極限生育水平，再鼓勵也沒有用；何況當時也沒有明確鼓勵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張)。在 1971 年中國開始計劃生育之前，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仍然祇有 6.0 左右)與印度、韓國、越南、泰國、巴西仍然沒有明顯差別。1971 年，以國務院批轉衛生部、商業部、燃料化學工業部《關於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為標誌，中國開始計劃生育，1973 年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面開始，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中國生育率從 1970 年的 5.8 快速下降到 1979 年的 2.75 (與現在印度差不多)。

可見中國人口“問題”並不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

此外，醫學條件也不允許中國在 1950 年代就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當時中國連避孕套都不能生產，絕大多數婦女都是靠接生婆接生，祇有頂級醫院能做人工流產手術，總不能將育齡婦女都置於生命危險之中？總不能將生下來的孩子都掐死吧？在 1970 年代中國醫學條件才開始成熟，避孕設施才有條件普及，才能比較安全地實行計劃生育(要說毛澤東在人口問題有失誤的話，就是不應該在 1973 年全面實行計劃生育，雖然當時是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到他 1976 年去世，並沒有少生多少孩子，但是為 1980 年代的極端計劃生育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

即便當時中國沒有毛澤東，而是一個西方式的議會，馬寅初的提議既違反西式的“人權”法則，又違反中式傳統道德，有一絲一毫通過的可能嗎？所以將人口問題算在毛澤東身上加以譴責是十足的誣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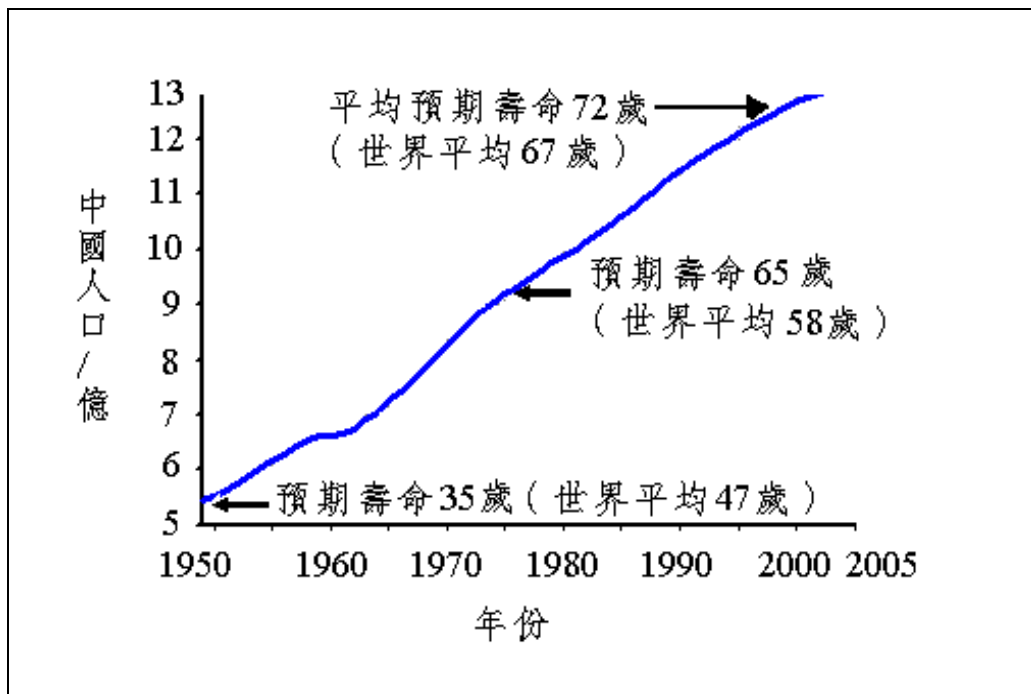
六、解放後中國人口快速增長原因

— 社會發展超前於經濟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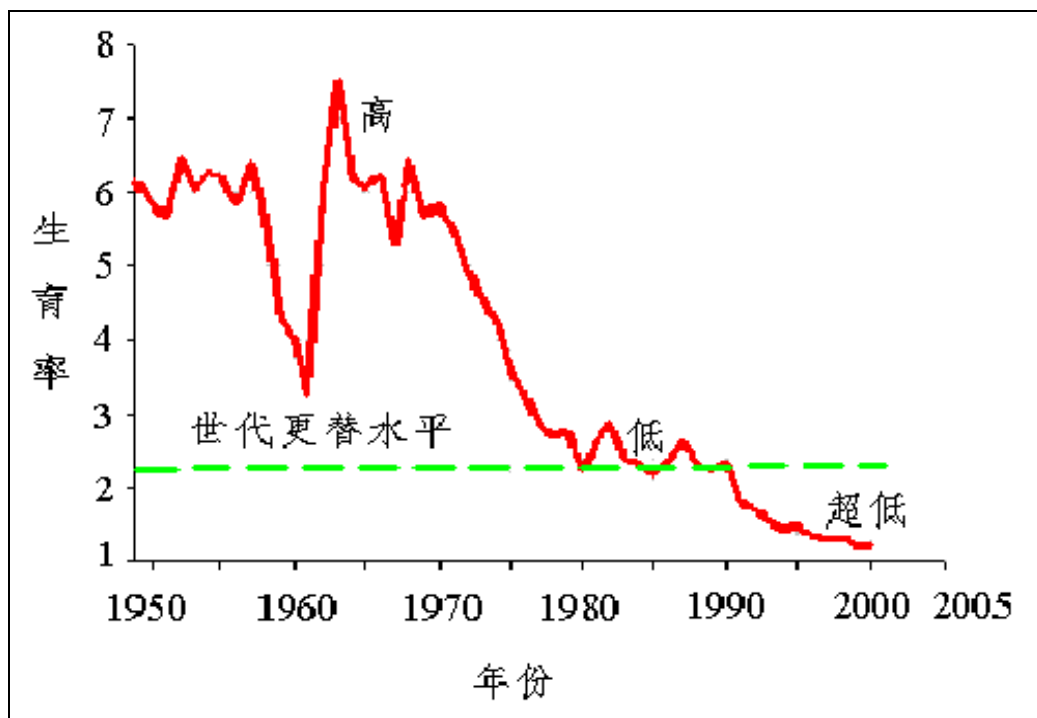
既然不是因為毛澤東鼓勵生育，那麼為什麼中國人口在解放後增長速度比同等發展水平國家（如印度）要快？

我們來分析一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三個指標。HDI 主要用三個維度來評價人類發展：能否過一個長壽而健康的生活，是否接受很好的教育，是否擁有體面的生活水平。因此，這個指數不僅包括收入本身，而且包括預期壽命、入學率和識字率等其他指標。

圖~1~1：毛澤東在人口方面並沒有錯



圖~1~2：毛澤東在人口方面並沒有錯



建國初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兒童死亡率都非常高。1949年以後，由於戰亂的結束，並因為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建設（袁隆平認為70年代的農田水利建設是歷史上最好的）和建立農村醫療體制（經過2003年SARS的流行，中國政府重新認識到農村醫療體制的重要性，痛定思痛，決定重新建立農村醫療體制），醫療衛生等方面得到長足的發展（中國醫療衛生和教育當時在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死亡率（包括嬰幼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急劇下降，壽命顯著延長，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延長到1976年的65歲，1981年的68歲（接近當時發達國家水平；印度當時祇有54歲），再到現在的72歲，而世界平均預期壽命祇從1949年的47歲延長到1976年的58歲、現在的67歲，中國壽命延長明顯快於世界平均水平，這些足以說明當時中國的醫療體制的正確性。而印度預期壽命現在都還不到64歲。並且中國的這

種社會進步主要是在 1979 年之前所取得的。可見當時社會發展明顯超前於經濟發展。最近世界銀行仍然高度評價中國當時的醫療進步。⁵

而根據聯合國發展署的 2005 年資料，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發展（醫療、教育等）是明顯落後於經濟發展的。中國在發展方面取得的顯著進步卻沒有使貧困人口受益。特別是沒有能夠將創造財富和提高收入轉化為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在廢除了公費醫療體制之後，中國 70~80% 的農村家庭沒有醫療保險，這方面的缺失導致了嬰兒的不必要死亡。在 1970 年代中國預期壽命比韓國長 0.6 歲，現在比韓國短 5.4 歲。1981 年以來中國預期壽命祇延長四歲，而印度延長十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王慧炯在評述聯合國報告時表示，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發展很快，衛生醫療卻是倒退的。

雖然中國婦女生育率與越南、泰國、巴西、印度等地區沒有明顯差別，相對於中國本國 1949 年前也沒有明顯變化，但由於死亡率降低、壽命延長，人口快速增加，中國人口從 1949 年的 5.5 億增加到 1970 年的 8.5 億、1980 年的十億。換句話說，1949 年後中國人口比其他國家增加要快，更大程度是因為“死的太少”，而不是“生的太多”。

一定要將現在的人口壓力歸因於毛澤東的話，那祇怪他將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降低太多了、將壽命增加得太多了。

其實毛澤東時代的那種將社會發展超前於經濟發展的發展模式

⁵ 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BN3_cn.pdf, 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BN4_cn.pdf, http://www.worldbank.org.cn/Chinese/content/BN5_cn.pdf。

（提高教育和醫療水平，降低嬰幼兒死亡率等），是不利於當時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為要將嬰兒撫養成人需要付出撫養成本和教育成本，“十年育樹，百年育人”，這些投入需要20年才能轉化為經濟力。但對當時的困難，熬一熬也就過來了，從民族長遠利益來看，那些投入是戰略投資。人口從來就是戰略資源，祇是很多人視而不見而已。

七、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

1949年中國人口5.5億，解放後中國人口迅速增長，1953年，中國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總計601,938,035人，估計每年要增加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三百萬人，增殖率為千分之20。歷史上一直缺乏的人口一下子變成社會問題了。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論”，他說：“中國人口這樣發展下去，十年後有八億一千萬，50年後多少？嚇死人！26億一千九百萬”，他提出“一對夫婦祇生兩個孩子”的主張。雖然他一直說他的“新人口論”有別於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1789年的《人口論》，但事實上仍然不過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變種。1959年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到批判。

1979年夏天，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審閱有關馬寅初的材料時，含著眼淚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於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共產黨應該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光明日報》1979

年 8 月 5 日有一文章標題是〈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意思是毛澤東 1959 年“錯批”馬寅初，從而“誤增三億”人口。中國人口 1959 年 6.6 億，1979 年 9.709 億。就是說依照馬寅初的理論到 1979 年中國人口祇能在 6.7 億左右，中國人口在壽命延長的情況下零增長。“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從此廣為流傳。

馬寅初老先生關注的是人口數量和增長率而不是人口結構，是通過減少新生人口來降低人口總量，實現人口的零增長，他主張每對夫婦祇生育兩個孩子。筆者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他那個時候提倡的生育兩個與現在生育兩個意義完全不一樣，建國初嬰兒死亡率為 20%（現在 2.55%），孕產婦死亡率為 1500 / 10 萬（現在 50.2 / 10 萬），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 25~30%（2003 年 2.99%），我國人民平均預期壽命從 1949 年的 35 歲增加到現在的 72 歲。馬寅初的主要思想是維持人口總量不增加，後面的計劃生育政策與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一脈相承的。事實上，除了馬寅初外，當時主張計劃生育的還有劭力子，劭力子見到人家生了一個孩子後，就說：不要再生了。馬老先生提出的生兩個，在當時是錯誤的（當時高嬰幼兒死亡率、高孕產婦死亡率），在現在也是錯誤的（現在至少 12.5% 不孕，並且單身和丁克很多，祇願意生一個的不少，總和生育率連 1.7 都難以達到）。

在馬寅初提出人口論的 40 年前孫中山擔憂亡國滅種，在馬寅初提出人口論的三年後中國人口還接近負增長。馬寅初祇看到 1949 年以來幾年的快速增長，提出限制人口增長；而毛澤東卻從歷史眼光看到中國自 1800 年以來人口增加緩慢（中華民族佔全球比例自從 1800 年以來下降一半），而沒有立即限制人口增長（並且當時國際形勢不容樂觀，誰也難以斷言今後沒有戰爭）。

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均顯示 1959 到 1979 年共出生

4.57 億人口，按照《光明日報》的說法，不批馬寅初的話，人口會少增加三億，就是說要是依照馬寅初的觀點，其中三億是不應該出生的。換句話說，現在 26 到 46 歲之間人口應該為 1.57 億而不是現在的 4.57 億。這三億人口大都已經結婚，1959 年左右出生的婦女生育高峰在 1984 年左右，統計局資料顯示 1984 年總和生育率為 2.35；而 1979 年左右出生的婦女除了少部分沒有生育外，大多數都已經生育，平均生育率可能還不到 1.3。粗略假定這個群體平均生育率為 1994 年水平（當時總和生育率為 1.56），就是說假設這三億人口中的 1.5 億婦女平均每人已經生育 1.56 個孩子，那麼共有 2.34 億孩子。就是說多出的那三億加上他們已經出生的子女總共 5.34 億人口，雖然祇佔中國 2005 年底總人口的 41%，但卻佔了中國 26~46 歲人口的 65%，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 and 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多出的三億 26~46 歲之間的人，都是各部門各行業的主力呀！意味著現在勞動骨幹有一大半本來是不應該出生到這個世界的。沒有這三億年輕勞動人口，現在中國怎麼發展？經濟實力還能排世界第七？沒有這“多出的”三億及其兩億子女，中國確實達到某些人理想的八億人口，但 2005 年 60 歲以上人口同樣有 1.45 億（都是 1945 年以前出生的），比例高達 18.1%！現在國家祇承擔城市人口中四千萬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並且由全國人民納稅來支付（農民通過廉價勞動力支持國家基礎建設，並且是義務兵的主要來源，要是沒有 2.5 億農民工所創造財富政府財政就無法運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透露——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於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沒有這 65% 的勞動人口，老年人怎麼活？總理怎麼當？中國今後怎麼持續發展？現在 46 歲以下的人在嘮叨“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時，可曾想到要是當年沒

批馬寅初的話，你們中的一大半都不可能出生的。

減少那三億人口真的能讓中國富強嗎？城市化和工業化是歷史趨勢。減少那三億人口後，中國人口總數仍然不少（到現在還會有近八億），還是不能像中東那樣靠出賣原始資源致富（俄羅斯人口稀少、資源豐富，並且人口從 1992 年以來就不斷減少，但也沒有靠出賣資源而發財），還得靠廉價勞動力起家進行原始積累，比如前些年的基礎設施和重工業建設。城市化和工業化就會滯後，就業率不一定比現在高，經濟就無法起飛，整體國力肯定是下降的。沒有那三億壯年勞動人口，中國就沒有勞動力優勢，外國企業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湧向中國。就算人均勞動力收入會有所增加，但與現在一樣多的老年人需要贍養，實際生活水平不一定比現在高。人均養老比增加，意味著有相當部分勞動力時間需要花費在侍候老人，創造財富的時間是減少的。

有人因為現在的農民工收入不高，以為他們創造的財富也不高。事實上這不過是由於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罷了。但作為國家，農民工創造的財富是計算進了 GDP 的。沒有那些農民工，現在的“富人”不會富，國家也不會富。

在 1959 年採納馬寅初理論後，即使到 1979 年後也一直依照馬寅初的生育兩個的理論，那麼考慮到至少 15% 的不孕、單身、丁克等不育人口（其實光不孕家庭就佔 12.5%，並且正不斷上昇），不考慮嬰幼兒和孕產婦死亡情況，那麼生育率也祇能在 1.7。這 1.57 億 1959~1979 年出生的人口中有婦女 7700 萬，生育孩子 1.3 億。以婦女平均生育年齡為 25 歲計算，那麼 1954~1958 年出生的婦女生孩子也在 1979 年之後，這個年齡段婦女 4363 萬，以 1.7 的生育率計算，生育 7418 萬個孩子。就是說以馬寅初的理論，從 1979~2004 年祇能出生 2.05 億孩子。2000 年人口普查顯示從

1979~2000 年出生 4.239 億，加上國家統計局顯示的 2001~2004 年這幾年出生的五千萬左右，共出生 4.8 億左右，比馬寅初理論要求的 2.05 億多出 2.75 億。2005 年初 13 億人口，扣去這 2.75 億，也扣除 1959~1979 年多出生的三億，等於 7.25 億，就是說按照馬寅初的二胎理論，中國 2005 年初祇能有 7.25 億人口，確實是零增長。那麼現在中國 60 和 65 歲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別為 20% 和 14%（目前實際分別祇有 11% 和 7.8%），65 歲以上老年人比例高於美國目前的 12%（美國養老金制度已經建立 70 多年），相當於日本（現在為 15%）1996 年水平（日本 1996 年時人均 GDP 為 38555 美元）。

上面是粗測馬寅初理論的後果，我們再分幾種情況細測馬寅初理論的後果。依照馬寅初的理論，每對夫婦祇能生育兩個孩子，就是說政策生育率為 2.0。依照《光明日報》的說法，依照馬寅初理論從 1959~1979 年少生三億，《光明日報》可能是考慮到當時的高嬰兒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兒童死亡率。有人會說，即使有嬰兒、兒童死亡，但還可以再生（其實生育時間是有限的，補生並不一定成功）。那麼我們就分幾種情況分析馬寅初人口論的後果：

1、假設《光明日報》的說法是對的，將 1957~1979 年出生的 4.57 億按比例減少三億後，1980 年後仍然繼續馬寅初的“祇允許生育二胎”（每個婦女最多祇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不生育人口（不育不孕症、單身、丁克）在 1980~2000 年以 10% 計算，2000 年以後以 15% 計算（現在光是 不育不孕症 人群比例就高達 12.5%；但 1980 年代發病率要低一些，並且 1980 年代丁克思想還沒有流行）。

2、假設《光明日報》的說法是對的，將 1957~1979 年出生的 4.57 億按比例減少三億後，1980 年停止計劃生育，平均每個婦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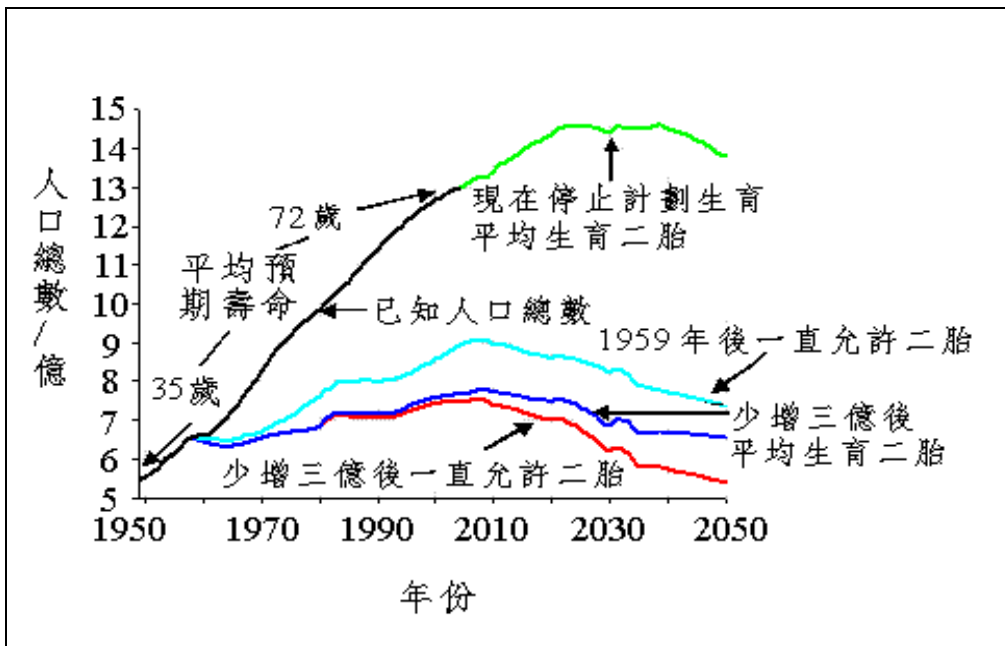
生育兩個孩子（由於有單身、丁克，並且一些祇願意生育一個孩子，就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另外一些人生育四、五個孩子）。關於這個方案的說明：由於從 1959~1979 年實行馬寅初的計劃生育方案，生育觀念已經不可逆地改變了很多（比如中國 1980 年代開始的嚴厲計劃生育，使得生育觀念在 1990 年代就發生質的變化；越南 1988 年開始計劃生育，生育觀念幾年後就發生質的變化），生育願望肯定下降不少，而扶養比又顯著增加，生育願望就更加下降，1980 年停止計劃生育的話，即使 1980 年代生育率還可能稍微高於 2.0，但 1990 年之後需要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才能使得生育率保持在 2.0。

3、1959 年後一直允許生育二胎，不考慮嬰、幼兒和孕產婦死亡情況，不生育人口 1959~1979 年以 5% 計算（當時不育不孕症發病率祇有 2% 左右，但仍然有單身），1980~2000 年以 10% 計算，2000 年以後以 15% 計算。

4、在“誤增三億”和“獨生子女政策”後，現在開始停止計劃生育，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兩個孩子（在目前的生育意願下，需要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才行）。

說明：生育婦女結構類比 1986 年的偏正態人口結構，未知人口的出生性別比以 105 比 100 計算。根據馬寅初理論，第一個方案是最悲觀的方案（到 1979 年紮紮實實少生三億），第三個方案是最樂觀的方案（到 1979 年祇少生 2.2 億），現實情況介入第一個方案和第三個方案之間。另外，還要考慮到馬寅初時代的中國政治現實：那個時候農村也是集體經濟，在政策壓力下幾乎沒有超生（就像現在城市人不敢超生一樣；1973 年開始計劃生育，允許生育兩三個，全國總和生育率在 1979 年就祇有 2.75，1980 年祇有 2.2 了）。

圖~2：1959年之後的不同生育方案下的人口總數預測



就是說沒有那三億“誤增”出來的人口及其子女，中國現在確實達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的7~8億人口，但這7~8億卻是老年化的八億，是不可持續發展的7~8億（能夠生育下一代的人口比例已經很低了，並且生育願望已經很低了）。

計生委資料⁶顯示：200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1.45億，65歲以上老年人1.01億分別是1945和1940年以前出生的；2015年的1.35億65歲以上老人、2.13億60歲以上老人是在1950年之前出生的，與毛澤東沒有關係；2024年的1.95億左右的65歲以上老人、2.9億60歲以上老人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與毛是否採納馬寅初的理論控制人口沒有關係。同理，2045年及以前的65歲以上老人都是1980年以前出生的，不受1980年代開始的極端計劃生育所影響，筆者在〈反思：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會怎麼樣？〉⁷分

⁶ 參見：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1420, 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1421。

⁷ 易富賢：〈反思：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會怎麼樣？〉，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香港傳真》No.2006~20。

析了沒有 1980 年代開始的極端計劃生育會怎麼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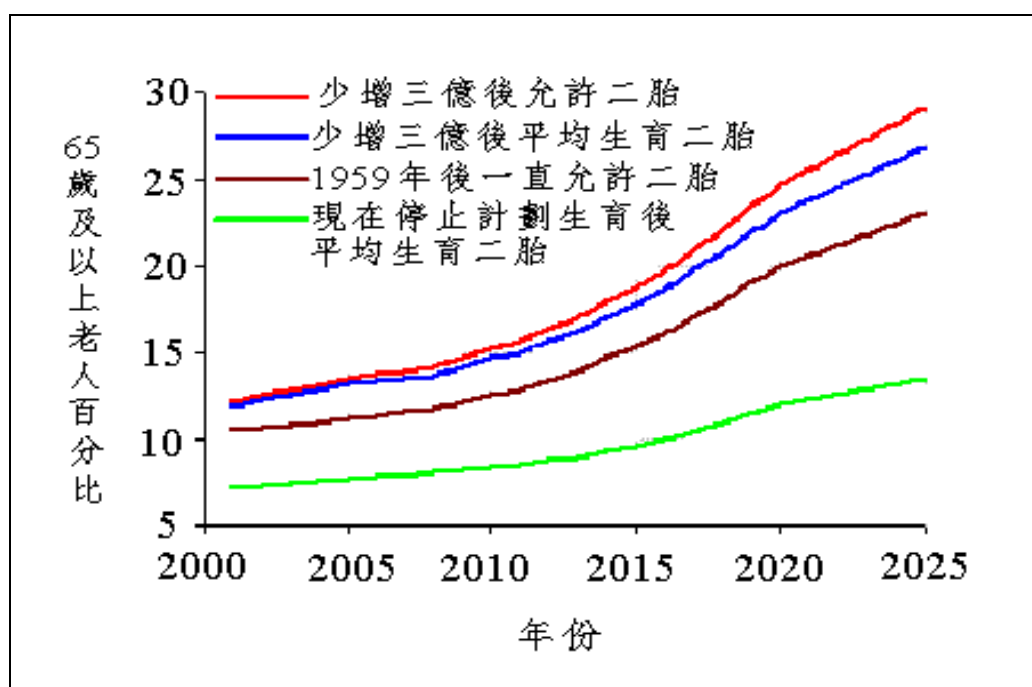
表~1：中國老年人口預測

年份	60 歲及以上老人 (億)	65 歲及以上老人 (億)	年份	60 歲及以上老人 (億)	65 歲及以上老人 (億)
2001	1.33	0.91	2014	2.04	1.30
2002	1.36	0.94	2015	2.13	1.35
2003	1.38	0.96	2016	2.21	1.41
2004	1.41	0.98	2017	2.29	1.48
2005	1.45	1.01	2018	2.36	1.56
2006	1.49	1.03	2019	2.40	1.64
2007	1.53	1.05	2020	2.43	1.72
2008	1.58	1.07	2025	2.96	1.97
2009	1.65	1.10	2030	3.55	2.42
2010	1.71	1.13	2035	3.97	2.92
2011	1.78	1.16	2040	4.11	3.24
2012	1.86	1.20	2045	4.25	3.29
2013	1.95	1.24	2050	4.50	3.36

資料來源：國家計生委 2003 年預測。

要想證明馬寅初理論是正確的，就得說明如何養這麼多老年人。要是按照馬寅初的理論是根本養不了這些老年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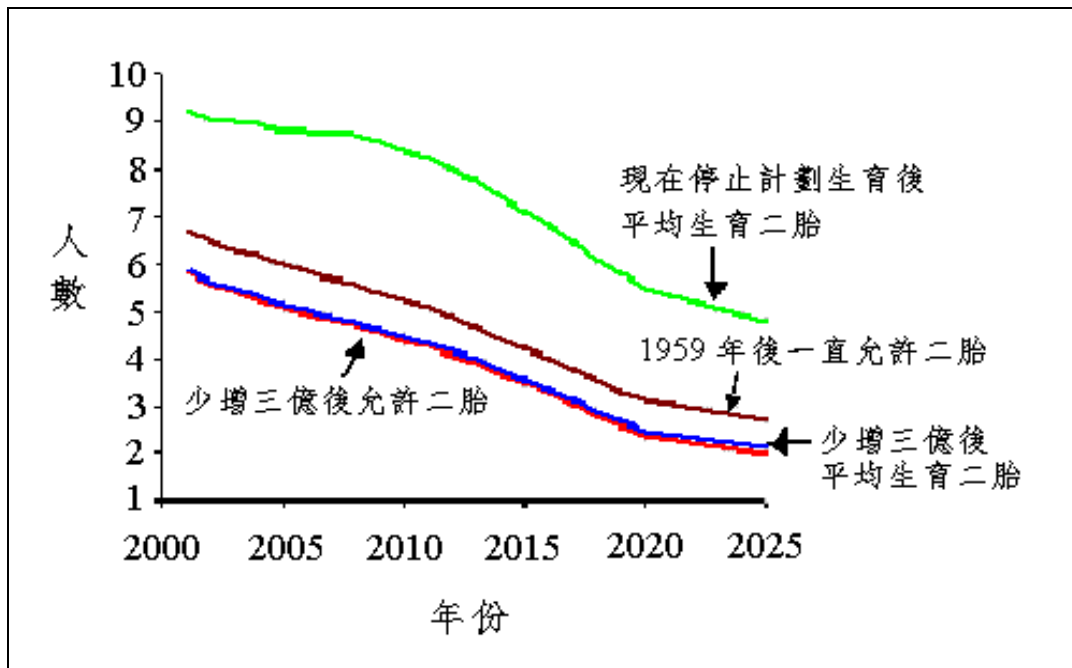
圖~3：1959 年後不同生育方案下 65 歲及以上人口比例



2024年及以前的65歲以上老人都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與當時是否採納馬寅初人口論沒有關係，不同的方案雖不能改變老年人數目，但卻通過改變總人口數目而決定了今後老年人比例。

即使在1979年之前依照馬寅初理論控制人口，而在1980年之後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到2024年也不會達到八億，如何養活超過25%的65歲以上老年人？即使退休年齡延遲到75歲（一大半人到死都拿不到退休金），社會也無法運轉。由於持續的低生育意願和低生育率，人口結構一步步老化，經濟規模和人口數量在全球的份額也一步步下降。

圖~4：1959年後不同生育方案下一65歲及以上老人對應的勞動人口（18~64歲）



目前是九個勞動人口（18~64歲）對應一個老年人口，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於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依照馬寅初理論，到2024年是兩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怎麼養老？

馬寅初人口論錯就錯在在戰後壽命延長的情況下謀求人口零增長。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35歲延長到1976年的65歲和現

在的 72 歲，在這種情況下人口零增長意味著什麼？等壽命平穩下來後人口結構會是什麼樣？

任何一個命題都是靠歷史鑒定的。打個比喻，一個工廠要長期存在和持續發展，就必須老中青三結合。師傅教徒弟時，要費心費時，甚至影響師傅的工作效率。要是祇考慮當年的生產的話，就根本沒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慮企業的長期發展，必須不斷吸收新的力量。否則人才結構會斷代，那時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面有經驗的師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訓練才能真正成材）。

計劃生育一方面省一筆費用（養育小孩的費用），另一方面母親減少養育小孩的誤工時間，理論上、表面上用這個時間工作可以增加社會財富，也就是人口學界所謂的“人口紅利”。但是相對於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來說，計劃生育其實並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⁸ 卻透支今後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本身就會有就業壓力（這個壓力不是人口本身，而是社會發展模式的轉變所固有的，歐洲、美國都曾經歷過這段時間），計劃生育使得中國婦女勞動參入率罕見地高，大大加重了就業壓力、增加離婚率。經濟學認為，養育三個孩子的花費祇是一個孩子的 1.6 倍，這還不計算精力上面的節省。但卻因為“獨柴難燒、獨子難教”，花了高額費用後往往難以得到預期的教育效果。⁹ 獨生子女政策搞了 20 多年了，少生了 20 多年的孩子，我們來看看：

⁸ 易富賢：〈中印比較：計劃生育對中國做出貢獻了嗎？— 聯合國權威資料顯示中國計劃生育是錯誤的〉，<http://column.bokee.com/123828.html>，<http://www.dajun.com.cn/jhsysunshi.htm>。

⁹ 易富賢：〈現在養小孩為何這麼貴？— 計劃生育以三倍的成本培養一個勞動力〉，<http://column.bokee.com/64393.html>。

孩子少了，上學應該更容易了吧，應該免費義務教育了吧？
沒有！

孩子少了，工作應該更好找了吧，收入應該更多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醫療應該更有保障了吧，看病住院不用擔心了吧？
沒有！

孩子少了，住房壓力應該更小了，人人有其屋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環境美化的更好了吧，污染應該沒有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父母壓力小了吧，大家應該都小康了吧？沒有！

再來看看：

孩子少了，學費更高了。

孩子少了，房子更貴了。

孩子少了，醫療更享受不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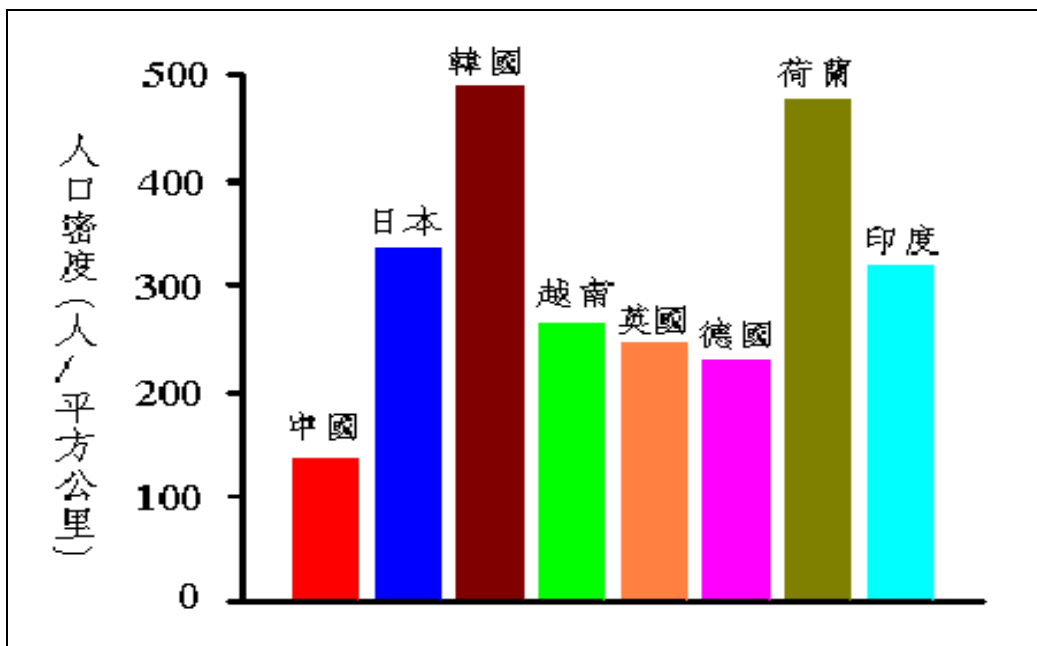
孩子少了，環境更破壞了。

北宋政治家和史學家司馬光在寫給他兒子司馬康的一封信《訓儉示康》中，提出“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著名論斷。隨著經濟的發展，心理撫養能力反而是下降的，總撫養比是不斷降低的，生育願望是不斷降低的，這也是發達國家不要小孩、家庭越來越小的原因之一。計劃生育暫時地使中國由儉入奢，人為地增加社會培養成本。經濟越發達，養育小孩的相對成本越高，計劃生育使中國在低成本時候限制對未來勞動力的培養，等今後高成本時候中國又無力鼓勵生育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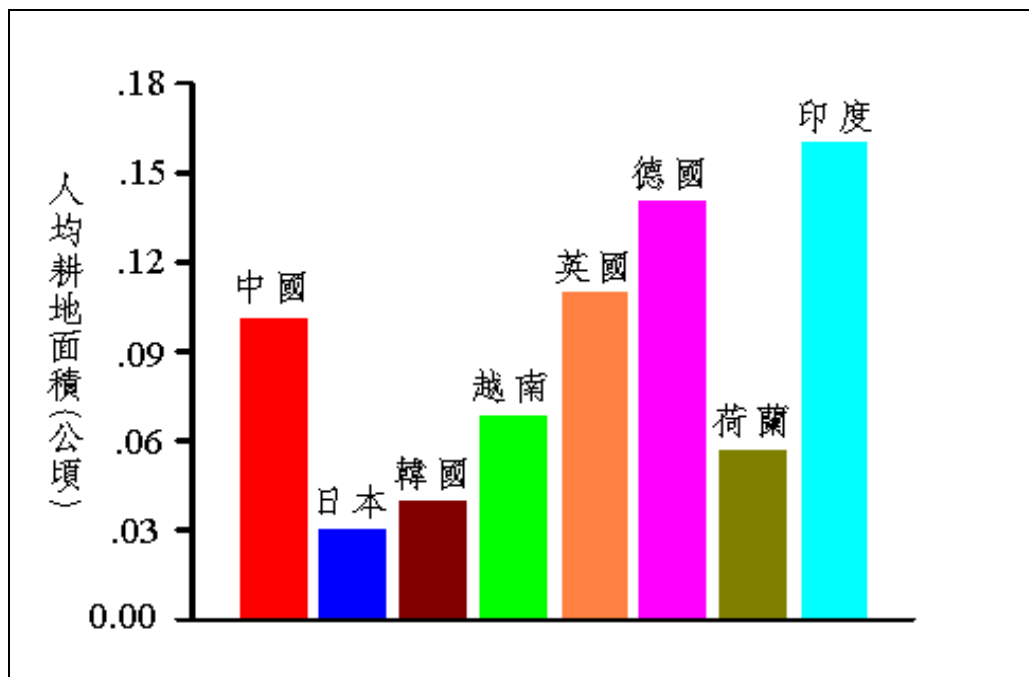
總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齡結構，生育率在 2.1 才能保證下一代相對這一代不會減少也不會增加。1971 年前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有 5.8 左右（每個婦女平均生育 5.8 個孩子），2000 年國家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金指標）顯示總和生育率祇有 1.22。5.8 的生育率意味著我們這一代是上一代的 2.76 倍；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 1.22 的生育率計算，我們下一代祇是我們的 58%。可以看出現在老年人

多舒服，而我們的晚年又多麼淒慘。少壯不努力（生兩三個孩子），老大徒傷悲。

圖~5~1：中國人口過多是個流傳已廣的謠言



圖~5~2：中國人口過多是個流傳已廣的謠言



註：中國還有 60 億畝草原，其中 43 億畝可利用草原（僅草原面積就超過了

印度國土面積)。世界淡水資源的 65%集中在加拿大、俄羅斯等十個國家裡。人均淡水(立方)：中國(2250)，韓國(1469)，印度(2228)，德國(2096)，英國(1219)，法國(3415)，以色列(260)。在世界上 45 種主要礦產資源儲量價值比較中，按礦產總值比計，中國居世界第三位，人均居世界第十位。

政府的職責是引導民衆發展經濟，儘量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要是通過編造人口過多的謊言，降低人口的增長，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當政府領導，明朝末年的張獻忠在四川就當過一次，他就是通過殺人來減少人口、利用已有財富。客觀上中國的人口已經很多了，不可能像切蛋糕一樣把現有的 13 億在保持年齡結構不變的情況降下來，應該從這個客觀事實出發，找出提高生活水平的辦法(無論從人均土地還是人均耕地，中國都不比日本、韓國和歐洲很多國家少)。要是中國不算“地大物博”，還有幾個國家算“地大物博”？

毛澤東時期的“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人口衆多”的宣傳本身就是一種自信的表現；但後面為了實行計劃生育，卻不惜隱瞞資料，灌輸“人均不足”觀念。誠如胡錦濤主席所說：“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要是連人口資源都不善於利用，對其他資源肯定也是粗放式利用。這也就難怪中國每消耗一千克能源所生產的國內生產總值為 0.7 美元，韓國為 1.8 美元，日本為 6.1 美元，泰國為 2.1 美元。中國投入 40 美元掙七美元，而印度投入 24 美元掙六美元。以這種粗放式利用資源的方式，人口減少一半都不夠。用“人口過多”來掩蓋這種粗放式的發展模式，實在不值得！

“以人為本”，這個“本”是不能輕易動的，其他的發展都應該圍繞著這個“本”的。但自從 1980 年以來，這個“本”成了唐僧肉，什麼部門都想吃一口：環保部門認為環境問題是“人口太多”，經濟部門認為失業問題是“人口過多”，交通部門認為

交通擁擠是因為“人口太多”，近年電力短缺、糧食短缺也被認為是“人口太多”……。以減少新生人口為標誌的現行計劃生育是作為基本國策出現的，竟然有將降低新生人口的增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基本國策的！不論對個人的養老，還是民族的繁衍，“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是千真萬確的。

凡事皆有個度，過猶不及。世代更替水平就是人口上的這個度。1979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祇稍微高於世代更替水平，通過發展經濟就完全可以短期將生育率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毛澤東的人口政策已經將高生育率這隻“蛇”打死，1980年代根本沒有必要實行嚴厲計劃生育政策，198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是打“死蛇”。少出生的1.3億（最悲觀估計也不超過2.2億）人口大大加重了今後老年化。

雖然作為一個近八旬的老人當時提出“新人口論”從學術上並不為過，但馬寅初在接受了計劃生育先驅者的名譽的時候，就註定了要為這個事情承擔歷史的責任。歷史表明，馬寅初的所謂的人口理論是錯誤的，以馬寅初理論和“人口控制論”為依據的80年代以後的嚴厲／極端計劃生育政策更是絕頂荒謬的。當時預測“中國人口2050年將達到40億”，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後在2030年之前不會出現老年化（事實上1999年中國就進入老年化社會），這樣中央才決定實行計劃生育的。其實1980年就不實行計劃生育的話，中國人口高峰達不到18億，然後會減少，¹⁰毛澤東的直覺勝過馬寅初的學問！

馬寅初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徵，我不知道具體原因，但要是僅僅因為是在人口問題上用一個錯誤的理論與毛澤東的爭執，

¹⁰ 易富賢：〈反思：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會怎麼樣？〉，《香港傳真》No.2006~20。

那祇能說明中國自由主義的淺薄。

1980 年左右多位學者提出中國最適人口為七億，為計劃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有學者甚至提出無嬰年的方案。現在李偉雄、李小平等人仍然堅持要將中國人口降低到五億、三億。計劃生育不就是民族自殺嗎？鼓勵個人自殺是犯罪，難道鼓勵民族自殺反而成了功臣（一大批學者步步高昇）？

要是順著一些人口學家的理論，你會承認中國人口真的應該降低到七億甚至三億。“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筆者偏偏不鑽進計生委和一些人口學家的理論套路，才能看出計劃生育的荒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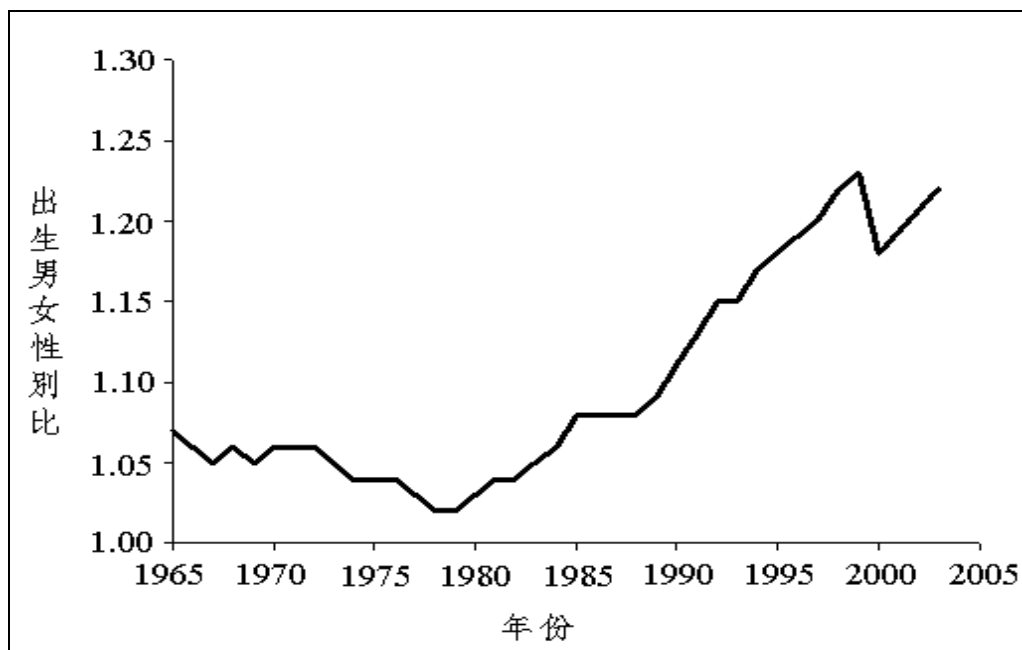
毛澤東在一些方面做得不好，但在人口、醫療、高科技發展、能源開發、民族工業建立等方面是沒有錯的，我們要一分为二。要是在人口、醫療等方面反毛，祇能說明反對者的淺薄。近年中國礦難頻發，有人認為是本屆政府的責任。其實從某種程度上說，本屆政府在為前兩屆政府指黑鍋。近年礦難增多是因為電力短缺，市場需要加速開採煤礦。為什麼會電力短缺呢，是因為幾年前學者判斷失誤，政府在 1997 年後連續五年限制電力投資。從更長遠看，2003 年法國核電已經佔總發電量的 85%，減少石油進口，充足的電力不僅滿足了國內的需求，還可向歐洲鄰國出口。而中國核電發電量僅佔我國總發電量 2%。要知道中國在毛澤東時期在核能研發上已經居於世界前列，但改革開放以來在核能利用上幾乎停滯。現在還得很大程度依賴煤電，誰應該為每年死去的礦工負責？請看《光明日報》：〈“核”之聚焦：從毛澤東的遠見到中國能源安全〉。¹¹ 要是這樣一屆一屆地指黑鍋，怎麼持續發展？今後的政府指得起養老金短缺這個大黑鍋？不考慮可持續發展的

¹¹ 參見：<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120096.html>。

經濟祇能是掠奪經濟。唐代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複哀後人也”。“後人複哀後人”，正好反映了中國歷史在變中保持不變的宿命。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才能結束這種宿命。

1959~1961年大躍進中國人口死亡既因天災，也因人禍，但具體數目還有爭議。但1980年代以來的計劃生育卻是減少了1.3億（最悲觀估計也不超過2.2億）人口，姑且不談這個。聯合國認定的出生性別比正常值域標準是男孩比女孩=102~107比100。1980年以前中國出生性別比正常，但自從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以來，中國出生性別比不斷攀昇，現在已經超過121（海南、廣東分別超過135、130），導致1980年以來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出2700多萬（正常情況祇會多出一千萬），1980年以來1700萬女嬰哪裡去了？這還祇是被迫“自願”的。還有更多的強制墮胎手術。這些都已經是生命了！

圖~6：獨生子女政策引起出生性別比增高



註：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其實現在的父母對男孩女孩的偏愛就像對魚和熊掌一樣都喜歡，但現行計劃生育偏偏祇能讓父母選一樣。生一胎沒兒子比例二分之一，生兩胎沒兒子比例四分之一，生三胎沒兒子比例八分之一，生四胎沒兒子比例 16 分之一……。最保守的估計中國家庭至少有 15% 的不育，都允許生兩個孩子（並且都生兩個），然後沒有兒子的可以（也都）繼續生下去，總和生育率也祇有 1.9，還達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目前的經濟結構，有幾個願意這樣生下去？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是西方各個領域學術研究的一本重要工具書，大約有 3300 萬字，十多萬個條目，記載了世界各國的重要科學人文的發現、概念解釋和傑出人物。在《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裡，有當代很多中國文人和科學家，卻根本沒有馬寅初這三個字，因為馬寅初人口論無非就是抄襲了一點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卻被樹為什麼偉大的英雄。對馬爾薩斯人口論，馬克思批判過；恩格斯批判過；孫中山批判過；毛澤東也批判過。但中國 1980 年代還是採納了馬爾薩斯理論控制人口。

馬寅初提出的“對祇有兩個孩子的父母加以獎勵，而對超過兩個孩子的父母要抽稅。”這一明顯帶有“行政命令”與“計劃經濟”色彩的建議，當時並沒有被政府採納。而這又明顯是 1980 年代獨生子女政策後，“獨生子女費”與“超生罰款”的理論依據。

有人說：馬寅初僅僅是一個學者，學者的理論是否會成為國策，取決於決策者是否採納。如果採納了，由此產生的功勞是決策者的，過失也應當是決策者的；讓學者來負責，於法於理，都說不過去；學者的理論，祇要不違反法律，就應當讓人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如果要求學者的理論一定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才能發表，那以後誰還敢說話？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僅僅是一家之言，過去批他，是政治環境和學術環境不正常的表現，現在，為什麼又拿他當替罪羊？

這些話確實有些道理，但決策者不是全才，對很多事情是外行，需要一些嚴謹的學者作參謀，需要一些正確的理論作指導。允許學者犯錯誤，但不等於縱容犯錯誤。在涉及民族長遠利益的學術需要非常嚴謹，至少方向不能錯，但劃生育的幾個理論連人口結構都沒有考慮，老年化都沒有考慮（就更沒有考慮改變全球民族構成的問題），能算嚴謹嗎？這些人能算人口學家嗎？都讓決策者承擔責任也不太公平，學者就沒有責任心了。學者不能光是想著憑藉理論步步高昇，而不想到後果。計劃生育是專家誤國的典型！

《戰國策·中山》：趙武靈王想要攻打中山國，派李疵去仔細察看，李疵說：“中山可以攻打，如果君王不去攻打，恐怕就要落在諸侯後面了。”趙武靈王說：“為什麼？”李疵回答說：“中山君禮賢下士，到窮街小巷之中，車子難以通行，就取下車蓋，甚至下車去拜訪士人，像這樣，總共去了七十家。”趙武靈王說：“這是賢能的君王啊，怎麼可以去攻打他呢？”李疵說：“不對，如果任用士人，那末，老百姓就會致力於揚名，而不存心於農耕和作戰；如果拜訪賢者，那末，農夫就會懶於務農，戰士就會怯於作戰。像這樣而不亡國的，還從沒有過啊！”老子也說過：“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不尚賢，使民無爭”。美國名牌大學的正教授平均年薪是人均 GDP 的兩三倍，中國人均 GDP 1.4 萬元人民幣（扣除公共花費，中等家庭收入祇比這個數字稍微多一點），中國名牌大學的正教授平均月工資祇有三千元？中國現在不乏“百萬教授”，每個家庭貢獻 30% 收入的話，需要兩百戶才能養一個這樣的精英（在其他國家是不可能的，至少比例遠比中國低），相當於古代的功勞顯赫的百戶侯、千戶侯。教師待遇高了，學生上不起學了；醫生工資高了，老百姓看不起病了；科技人員待遇高了，中國自主創新能力與國際差距拉大了。

現在國家過度重視所謂的精英，而忽視大眾，尤其是在人口政策上幾乎由人口學界所壟斷，是很危險的。像吃飯、睡覺、生孩子的事情，難道也得由專家來壟斷？古代對社會學人才思賢若渴，是因為當時接受教育的人才少（這些人接受教育時間大多也還達不到現在高中程度），現在普通線民大多都接受了高中或者以上的教育，祇要給他們瞭解真相的機會，他們自然會對社會問題做出接近事實的判斷。人口問題是國家的根本，其意義非常全面，豈是人口學家和幾個經濟學家就能說了算的？難道人口學家的歷史、軍事、法律、社會學、醫學、心理學等知識真的比普通網友要全面？現在國家將這些學者抬得太高，有些人還真以為自己是上帝。現在在人口政策的調整上，要吸取中山國亡國的教訓，要重視大眾民意。

筆者說的是批馬寅初人口論，不是馬寅初本人。事實上，毛澤東也祇批了馬的人口論，批馬寅初是在 1959 年，馬寅初於 1960 年自己到教育部提出口頭辭職。這個時候的馬寅初已經 78 歲了（哪個大學有 80 歲的校長？），後面一直仍留下一個全國政協常委的名義。馬寅初仍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比老帥日子還好過），1980 年代實行極端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馬寅初擔任人口學會名譽會長，享年一百歲。

國際上人口學都還屬於幼稚學科，遠沒有完善，比如聯合國對於人口預測就從來沒有準確過，說明人口學界缺乏新思維。中國在 1980 年代人口學起步時候將馬寅初搬上神龕，採納的是馬寅初、馬爾薩斯的觀點而建立起的中國的人口學科，導致中國人口學先天不足，一開始就走向了錯誤方向。

既然馬寅初作為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象徵，不批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不澄清事實，就不會有為人口政策伸張正義的那一天。